



人民就是最大众

□李春雷

人民,是我们当下谈论最多的一个名词。

真正的人民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权利说“我是人民的一分子”。但你代表的是个人,并不是人民。因为你只是个案,或最多是小众。而人民,是一个意蕴丰富、广阔无边的世界,涵盖着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包括信仰与追求、内心和外在。所以,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作品的“人民性”是自己进行文学创作时面临的一个重要概念。

文学的人民性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叶的俄罗斯。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提出,文学应该反映“人民的意识”,要求作品“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表现人民生活中美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文学的人民性,并且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赋予它新的涵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著作中曾直接提到“人民性”,说这是“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并且指出“从人民的利益的观点来考察”作品。列宁曾明确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基础。”这些经典论述,为我们正确地理解文学的人民性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从文学的人民性的概念发展来看,人民性是文学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属性,强调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指的是作品对人民的态度和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的人民性也有着不同的涵义。因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说明文学就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

在这个全媒体的信息时代,我们再次谈论人民性,重要的不是概念、理论上的廓清和厘定,而是在实践中的实施和建设。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有志于反映时代本质的作家,只有多等地、深入地融入社会,融入生活,融入人民,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现实,进而精准地反映现实,体现文学的人民性。这是一个客观的,甚至是科学的法则。

为源头活水来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泉。文学的人民性,离不开扎实的生活基础。谈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常常有作家朋友说,我们本来就是生活在生活中,我们本来就是人民的一分子,还体验什么呢?

是的,你的生活真真切切,水水灵灵。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或许你是一个教授,是一个记者,抑或是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你熟悉的,只是你自己生存的空间。除此之外,对于这个阔大的现实社会的主流脉动,对于更广大人群的真实生活,你熟悉多少呢?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前后,从小知识分子家庭走进上海的丁玲,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一系列以个性和女性解放为题材的作品,轰动一时。如果她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可能是另一个张爱玲,是一个“心灵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的

叛逆的绝叫者”(茅盾语)。但由于时代原因,她的生道路发生了改变。她走向了延安,走向了人民,走向了最火热的生活。于是,她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的道路,正是延安生活使她的文学创作发生了质变。1946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她背起包袱,来到桑干河畔,实实在在、真真正正地与农民生活、战斗在一起。农民从几千年封建压迫中挣扎出来的伟大力量震撼了她;农民淳厚、质朴的品质吸引了她;土改中纷纭复杂的社会现状丰富了她。她走家串户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逢到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她总是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提建议: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更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

如此深层的现场体验,才使丁玲的创作不是从概念和公式出发,而是循着生活的脉络,真实地书写。小小暖水屯,就是一个小社会,各种关系犬牙交错。富裕中农顾涌既把大女儿嫁给了外村富农胡泰的儿子,和本村地主钱文贵是儿女亲家;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儿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儿媳妇出身贫农;另一个儿子在村里还当着青联主任,是一个积极要求上进、工作不坏的干部。钱文贵是群众最痛恨的恶霸地主,可是他的亲哥钱文富却是个老实的贫农,堂弟钱文虎又是村工会主任,儿子更被他送去参军。斗争最坚决的贫农刘满,他哥哥刘乾却当过伪甲长……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生存环境及农民心态的复杂性、丰富性,将政治、经济、家族、血缘、道德、文化、个体心理等元素进行了如盐溶水、不露痕迹的成功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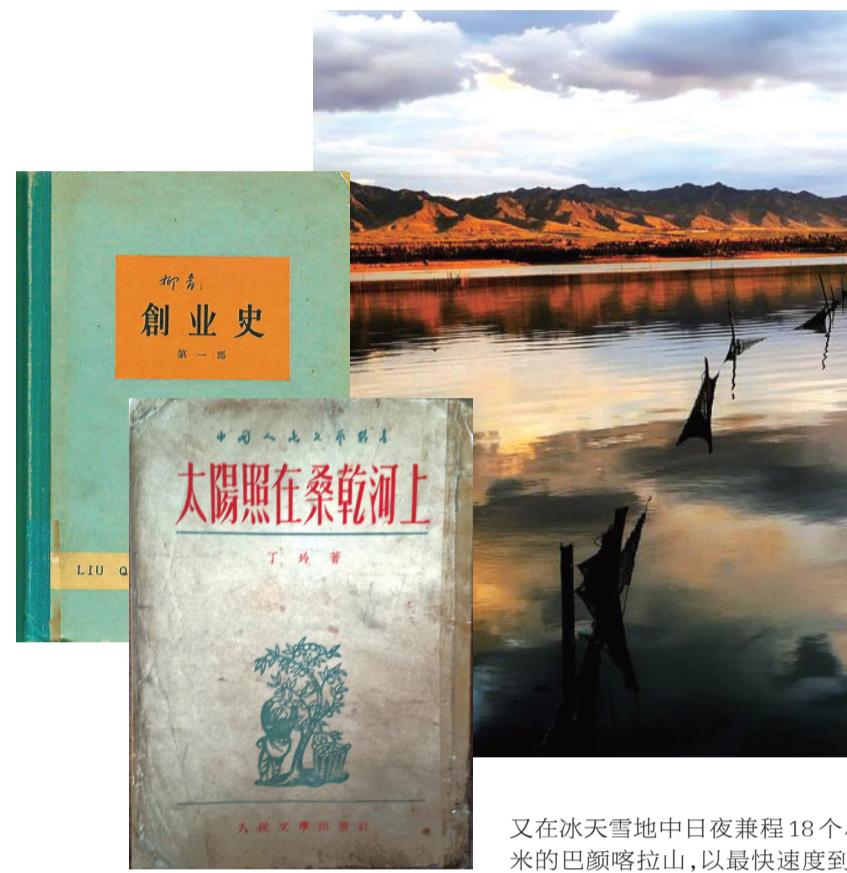
正是这些独特成就,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显得更加真实、深刻、可信和可亲,超过了同一时期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从而成为一部文学名著,成就了丁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还有柳青,为了真正体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酸甜苦辣,他从大城市直接把自己下放到最基层农村——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这是一种真正的深入,深层的融通,由走近而走进,由了解而理解,由感染而感悟。正是踏踏实实地深入体验,他才创作出了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创业史》。

人民,一枝一叶总关情

我们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而不是贵族文学。文学艺术来源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道理和道路,就在面前,最关键的是如何去实践,去实现。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这确实又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虽然我们都置身生活中,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天地还是太有限了。当下的社会,处于特殊的转型期,世界一体化,信息全覆盖。多元的影响,使得我们所



处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全新生态。面对这一切,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走出自己已经熟悉的、舒适的、习惯的生活,走进更广阔、更基层、更陌生的领域,去学习、去热爱,去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并进行美的创造。

众所周知,工业题材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比较难以驾驭。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文学青年,我更是感觉陌生。1998年,为了创作自己的长篇处女作,我曾经在邯钢体验生活一年时间。我骑着自行车,走遍了分布在邯郸市周边的多家邯钢生活区,采访了数百名邯钢人。为了体验钢铁工人在特殊时段的心境,我经常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甚至当夜的除夕夜,我也没有回家,而是在炼钢炉旁与工人一起吃饺子值班。当天深夜,遭遇钢包大喷事故,钢液飞溅,极其危险,我躲避不及,左手小拇指被钢液烧伤,鲜血淋漓,至今仍留有白花花的伤痕。正是这些亲身体验,正是这次剧痛,把我与工人兄弟之间的情感彻底打通了,再看到他们便感到格外亲切。

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天,我主动请缨,成为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一员,并最早到达震中。当时的震中地区时时发生强烈余震,极其危险。我背着睡袋、干粮和饮水,在滚石乱飞的深山里采访,长达一周时间,几度死里逃生。正是这些特殊的体验,让我创作出《夜宿棚花村》等作品。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我再次主动请缨。在中国作协的支持下,我独身一人连夜飞往西宁,在冰天雪地中日夜兼程18个小时,翻越4824米的巴颜喀拉山,以最快速度到达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雪域深处的震中——结古镇。由于行动突然,缺乏休息,再加上高原反应,我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满眼金星,头痛欲裂,几次昏倒,只能依靠吸氧和喝葡萄糖维持。前线指挥部急忙联系飞机,让我与伤员一起转移。但我明白,北京方面只有我一个作家在场,使命在身,不能后撤。正是有了这样深刻的体验,我再次创作了4篇报告文学作品。

为了创作反映129师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我曾沿着刘邓当年行军作战的路线,在河北、山西的深山里奔波两个月,行程数千公里,搜集资料200公斤;为了体验民工生活,我曾主动搬进50多个民工居住的帐篷里,在汗臭、脚臭和鼾声中住宿了一个星期……

“扎实生活,诚实写作”是作家的基本准则。

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拥有丰厚的生活经验积累,才能对生活有独到的认识、理解。有了独到的认识和理解,必须虔诚地对待,苦心孤诣地去创作,经营好自己的一方心田。诚如是,才能有所得。

歌德在《歌德谈话录》中强调“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所特有的内在自我”(才能和内心生活)是不足凭的,个人智慧的最后根源是群众智慧而不是天和神。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每个人都是“集体性人物”,也就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文艺须从客观现实出发——这是歌德的文艺观中最基本的一条。他强调不要学席勒那样从抽象理念出发,“为文艺而文艺”,而要先抓住亲身经历的具体个别的客观现实事物的特征,为“较高的旨意服务”。他说:“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你不会缺乏作诗的动因……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所以,歌德的作品是“由现实提供作诗的动机,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就是“诗人的事”了。

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说,“人民性”就是“较高的旨意”。只有舍弃“小我”情调,永葆“大我”情怀,心向大众,才能把自己的作品“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特别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能不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坚持文学的人民性,心系人民,深入生活,才能潜心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真正的文学作品,虽然是艺术,虽然不能说教,但最不能缺少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立场和时代政治背景。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说得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是文学的大道——也是一个作家的为人之道、为文之道。

■新作快评 刘建东中篇小说《黑眼睛》,《当代》2017年第1期

先锋写作的证明题

□王文静

《黑眼睛》是刘建东“师徒”系列中篇小说的又一新作。从早年的《减速》到近两年的“师徒”系列中篇,刘建东执著地走在先锋文学从形制到内涵的探索和突破上。《黑眼睛》不仅没有因为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流畅的情节脉络削弱其先锋性,反而在叙述的褶皱中闪烁着经典的光芒。

炼油工厂骆北风在一个暴风雪的晚上救下了因巡检冻晕的徒弟欧阳炜,却并没有为他们已经萌生的恋情增加“英雄救美”的浪漫。省工人报社的记者黄楣佳对欧阳炜保护国家财产的报道没有达到“政治高度”,骆北风就在黄楣佳和厂建设指挥部孟指挥的引导和说服下,激动而坚定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阴谋破社会主义建设的坏分子,变成了一片烘托欧阳炜光辉形象的绿叶。在违背事实丑化自己的过程中,骆北风从一个为了毛主席像章骑行20多公里的爱国工人、一个为了女友奋不顾身的赤诚青年变成了青面獠牙、狰狞猥亵的反动分子。在这里,人物的荒诞感已经转入精神和命运的层面,先锋的书写不是退缩了,而是更深入、成熟了。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命运急转直下的骆北风不再是爱岗敬业、勤劳朴实的师傅,他承受媒体的挞伐、工友的唾弃,他的“黑眼睛”开始了在黑暗中的坚持与追寻。在这追寻中,他用口琴挽回了当年怂恿和误导他的孟指挥和黄楣佳的生命,他用更多的想象和虚构完成了为欧阳炜在“三类人”认定中的辩护,在可以为自己证明和澄清的时刻,他在十八层地狱下的自己身上“又踏上了一只脚”。

作者对骆北风的塑造并没有止步于道德层面的书写,骆北风不断地寻找光明和力量来阻止命运

自由落体般的坠落,想用新的循环为自己的悲剧历史画上句点:炼油厂恢复建设后,他也曾想参加培训班提高工作能力,也曾在与段红霞的交往中收获惬意和放松,还在放下欧阳炜之后与小纪结了婚。但是,他最终还是因为“个人历史”没有资格参加培训;还因为组织舞会以“聚众流氓罪”被判了三年徒刑;象征着未来的“孩子”也与小纪一起绝望地冻死在寒冬的路边。一边是努力的寻找和不断的清洗,另一边却是应接不暇的新命运陷阱,骆北风往往都是以一个乐观者的表情勇敢地跳进悲剧的坑里,让一切的清洗都变成了继续抹黑。人物的荒诞和命运的荒诞让讽刺和象征在故作轻松的叙述里蔓延,先锋书写从形制上的表象、符号、变形、魔幻变成具有叙事逻辑和生活逻辑的内容上的跟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黑眼睛》中先锋表达在形式上的缺席。文本中“黑眼睛”几次易主,视角交替,感情更迭;口琴、仪表、冰笛子等意象交替出现象征意味浓重。当骆北风以个人的名誉为代价充当了欧阳炜的绿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腿脚不便的缘故,塔、管线、球罐、泵都在我视线中模糊了……塔和泵扭抱在一起,球罐是方形的,管线则像一滴滴水。”吹得一手好口琴的他,出狱后却再也吹不出音符。

刘建东的写作证明,先锋完全可以叙写日常和现实,这不是撤退,而是前进;不是重复,而是成熟;不是越来越弱,而是越扎越深。先锋精神不停止,先锋书写就不会停止。先锋话语也就不会也不能固化为世界文学的表达技术和服务于心的西方叙事美学,更有难度的是秉承先锋精神,把握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续写先锋文本在实验和开拓上的一往无前,避免在有效性和影响力上饱受诟病。

■短评

谁能解救一个拒绝解救的人

——王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解读 □隋桂悦

小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王斌以冷静、客观写实的笔法构造了一个超现实的故事:在一个不入流的电影学院,滑稽可笑的学生吴正大痴恋着电影圈的一位“女神”。同一宿舍的岳超峰整日沉浸在自己的哲学世界里,在某一天突然冷冷冒出了一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词语就像一枚炸弹击中了吴正大。

这是一个充满荒诞离奇色彩的变形和异化的故事。被所有人看好的岳超峰毕业后却郁郁不得志,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空有一腔热血无处施展;而被大家看不起的吴正大毕业后却在影视圈里混得风生水起、名利双收。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理想被现实绑架,拒绝解救,实际是现代社会人性的一种异化。

小说人物性格的塑造都是在房间里完成的,房间成为这部小说一个巨大的隐喻。小说的第一章详细叙述描写了吴正大和岳超峰两个人物,作者把这两个人物形象放在了学校宿舍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在这里,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吴正大凭窗远眺却只能看到浑然一体的灰蒙蒙的天空和大地。他走出去时又遇到了难以启齿的事情,只好又回到了房间。

在时间维度上,这个房间似乎是静止的。这并非指物理意义上时间的停止,而是在外部客观时间流动下,房间里的一切都是沉默、凝固、不会变化的。房间是主人公的舞台,也是主人公的名利场、堕落地和理想的不归路,是年轻一代价值观的变异,是对现实世界的反讽。房间隐喻关乎过去的记忆,斯德哥尔摩的践行、封闭的空间、凝固的

时间的叙述,事实上指向了吴正大颓败和死亡的内心世界。

与之进行对比的岳超峰的描写,则具有明显的反向互性。小说中那段岳超峰想把图书馆的书据为己有的细节描写,是他放在了图书馆这个大房间里进行描写的。在王斌的笔下,这个纷纷扰扰、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是发展、前进指向未来的,但又充满了赤裸裸的嘲讽意味。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隐藏着作者关乎当代社会人性的麻木冷漠、情感的疏离孤寂造成的个体孤独乃至死亡的深深的批判。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人的内心欲望越来越多,人的内心也被严重物化,正所谓欲壑难平,就像吴正大这样的人空有一个人的外壳,内心其实早就空了,但却能在这个世界中如鱼得水,这不是对现实的一个巨大的嘲讽吗?

文学即人学,人有七情六欲,《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对性描写都是“点到为止”,把性描写得很善良,也很唯美。属于人性的范畴,是对性的隐喻的解释,是对性的赞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性的描写更多侧重描写心理,借以表达的是性背后的隐喻意义。小说中吴正大的性格的完成是经历了他的性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面对他崇拜的“女神”时的“暗流涌动”;第二阶段是他在鲁燕燕的办公室,为了满足她的私欲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灵魂与肉体;第三阶段是对艾咪咪的性虐。作者以此表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人性的扭曲、异化,从而对社会现实进行嘲讽与批判。

文学即人学,人有七情六欲,《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对性描写都是“点到为止”,把性描写得很善良,也很唯美。属于人性的范畴,是对性的隐喻的解释,是对性的赞美。

岳超峰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两性的结合应该是灵魂与灵魂相交之后的升华,张秋雯只是对岳超峰的一种理解,而不是心灵的交流,因此岳超峰始终没有迈出最后一步。

岳超峰是孤独的,王斌对岳超峰这种孤独的宿命进行了独到的心理开掘,并不完全是绝望和伤感,而是有所赞叹有所抗争。在作者看来,那些现实社会中不愿向丑恶屈服的人往往是孤独的,也是最有生命价值意义的人,所以“孤独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作者试图让岳超峰能借助爱和性,走出这孤独。但失败了,于时代而言,岳超峰无论向哪个方向走,都是注定的失败者。小说引人深思的也恰在于此。